[文章编号] 1003－4684(2025)06-0081-05

重构与传播:知识翻译学视角下《边城》英译比较

虞 灿,肖家燕

(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8)

[摘 要] 基于知识翻译学的“以真求知”“以善立义”和“以美行文”等翻译标准,比较评析 Gladys 译文和 Kinkley 译文的语言特征及翻译方法。研究表明,Kinkley 译文偏重地域性文化意象的全面移植,注重保留并呈现原文的句序和线性结构,通过分词短语和不定式结构等英语习惯性表达,增强了可读性,也更加符合小说人物的语言风格。Gladys 译文偏重英语书面语言的表达,有时会省略或漏译一些文化意象,有损于地域性文化知识的重构和传播。但戴译文展现了表达文化知识的文体意识。由此而来,知识翻译学视域的评价有助于超越以往直译和意译方法的二元论,并促进文学翻译多维度评价视角和多元化评价标准的形成。

[关键词]《边城》英译;比较;知识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 H315.9;I046 [文献标识码] A

《边城》饱含了沈从文作为一名湘西人的情感叙事。小说通过生动的本土文化场景描述,将湘西的风土人情刻画得精彩纷呈。Gladys Yang(下称“戴乃迭”,1981)、Jeffrey C. Kinkley(下称“金介甫”,2009)先后将其翻译为英文,两版译文时间相隔近三十年,这一时间跨度不仅是翻译年代的差异,更映射出翻译策略的动态演变,为翻译中知识的重构与传播研究提供了可靠语料。刘小燕[3]在翻译美学视角下,分析、评述戴乃迭译文(称戴译文)下的审美再现;王建国、谢飞[4]从汉英语用差异,探讨译者的母语语用取向对译本风格的影响;刘汝荣[5]在操纵理论框架下,分析文化意象的移植和传播;黄勤、谢攀[6]从译者的“他者”文化态度,评析译者的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李艳荣[7]运用比较美学,讨论了民族色彩的翻译策略选择。上述研究为《边城》的英译评价提供了多元化视角,同时也为本文在知识翻译学视域下比较、评析戴译文和金介甫译文(下称“金译文”)提供了参考。

Kjell Arne Røvik[8]通过分析不同组织间的知识传播、适应和演变,论述了翻译是知识传输的观点,由此翻译活动被看作是知识的动态转移过程,这在中国翻译界引起热烈反响。杨枫[9-10]倡导知识翻译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应用;覃江华[11]讨论了翻译与知识生产、管理和转化的关系;蓝红军[12]具体阐释了知识翻译学的理论与应用方法;张生祥[13]从知识翻译学的视角,描述知识的转化活动。以上研究也表明,文学文本的翻译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知识重构和传播的过程。因为“翻译是知识跨语言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活动”[12],是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转化的过程。

与传统翻译理论相比,知识翻译学更加重视知识的重构和传播,将“以真求知、以善立义、以美行文”[14]确立为翻译评价标准。本文基于以上标准,比较、评析戴译文和金译文,探讨二者在语言表达和文化知识重构方面的异同。

戴译文出版于中国北京(1981 年),金译文出版于美国纽约(2009 年),二者出版时间相差 28 年。从“以真求知、以善立义、以美行文”等方面,可以更加清楚地发现二者之间的显著差异。

1 基于“以真求知”标准的译文比较

“以真求知”要求译者维持知识所指的物质本身,并以另一种语言载体进行表征,让读者充分了解原文内容[9]。基于这个标准,译者需要深入理解原文的语境、文化内涵和语言表达,避免曲解和误解,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知识传递。

例 1:带了香、烛、鞭炮同一个用生牛皮蒙好的绘有朱红太极图的高脚鼓,到了搁船的河上游山洞边,烧了香烛,把船拖入水后……。[15]

这段话描述了一个具有浓厚地方文化特色的仪

[收稿日期] 2024－1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4CYY071);湖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22ZD069)

[第一作者] 虞 灿(1998－),男,湖南岳阳人,湖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

[通信作者] 肖家燕(1966－),女,湖北武汉人,文学博士,湖北工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认知语言学。

式场景。香、烛、太极图和高脚鼓，都蕴含着丰富的湘西本土文化和中国文化特色的佛、道等宗教象征意义。

金译文：Carryingincense, candles, firecrackers, and a drum vermilion. Ceremoniously, they lit incense and candles … [2]

金译文采用直译法，将“香、烛、鞭炮”等文化意象移植到英语中，用“vermilion”（回译：朱砂）一词转换“朱红”这个文化负载词，虽未进行补充说明，其词源为朱砂，与中国传统制作朱红颜色的原料相似，比“red”一词，更能体现出民俗色彩。实现语义对等的同时，增强了易读性，实现了“明白晓畅，达意传神”的翻译目的[16]。金译文运用增译法，在“烧了香烛”之前，添加“Ceremoniously”，补充说明了这一叙事的目的，既保留了文化意象，又将“烧香烛”这一地方性知识传输到英语文化语境，补充说明了“烧香烛”的宗教仪式含义。这种译法既弥补了目标语读者对“烧香烛”仪式认知的空白，又避免了过度解释导致的冗余，展现了译者在文化移植与可读性之间的权衡能力，同时实现了文化知识的重构和传播。

戴译文：Carrying candles, fire-crackers and a big ox hide drum painted with a red diagram of the yin and yang, march through the hills to where their boat is kept and lighting the candles… [1]

戴译文省略了“香”这一重要文化意象，虽然采用直译法，将“烛、鞭炮”等意象加以移植，但造成了“香、烛、鞭炮”等文化意象组合的宗教仪式含义的缺失。原文“烧了香烛”中的“香”也被忽略，不利于英语读者对于中国湘西地方祭祀仪式等文化知识的重构和传播。此外，戴译文将“朱红太极图”翻译为“a red diagram of the yin and yang”，虽然通过音译法，表达了“阴、阳”等独具中国宗教文化特色的意象，但很难构建一个完整的宗教祭祀场景。此外，戴译文用“red”（回译：红色）一词转换“朱红”，淡化了祭祀场景的色彩含义，“朱红”色与血液的颜色接近，更容易产生“祭祀”相关的联想意义。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翻译时既要避免以他国、他乡的民俗替换，又需保留原语中的语言和文化信息[17]。金译文和戴译文都注重语言的流畅性和易读性，但在文化元素意象的移植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金译文保留了原文的全部文化意象，补充说明了这些文化意象的宗教含义，更大程度上实现了“以真求知”的翻译目标。

例2：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走得好。[14]

“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走得好”是汉语的谚语，用以批判有些人“希望得到好处，却又不愿意付出代价或努力”。

金译文：I want a horse I don't have to feed, but I want it to run fast, too![2]

金译文采用了直译法，实现了语义对等。金译文通过直译保留原文的文化意象，虽然增加了读者的认知负担，但却为英语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地方文化的窗口。这种直译方式虽然可能显得生硬，但保留了原文的质朴和直接性，有助于传播中国地域文化，增强文化知识的转化效果。

戴译文：I want to eat my cake and have it. That's me![1]

戴译文采用了意译法，用英语谚语“I want to eat my cake and have it”来转换，不仅避免了文化冲突，还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和接受度。这个谚语在英语文化中同样表达了一种想要两全其美但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愿望。戴译文还补充了“That's me!”表达人物的“自嘲”，使译文更接近原文的反讽修辞。

中国是内陆国家，关于马的谚语很多，而且大多具有褒义色彩。而在英语文化中，有关“马”的谚语褒贬意义不是十分明显[18]。金译文以“求真”为本，通过直译法，完整再现了“马”意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英语读者了解中国地方文化，实现地方性知识的传播。戴译文有助于英语读者理解这句谚语的内涵意义，增强了可读性和易读性，但难以传播中国地域文化。

2 基于“以善立义”标准的译文比较

“以善立义”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文本中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并将其准确地传递给目标语读者。同时，译者还需要注意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道德观念，避免引起文化误读或冲突[10]。

例3：本来从不骂人，这时正因等候祖父太久了，心中焦急得很，听人要她上去，以为欺侮了她，就轻轻的说：“悖时砍脑壳的！”[15]

方言和俚语以独特的形式表现某种文化的语言特性，也反映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19]。原句中“悖时砍脑壳的”是湘西方言中的俚语，其语用功能兼具情绪宣泄与轻微斥责，而非实质性人身攻击，重在传递翠翠因焦虑产生的瞬时情绪。这句话体现了小说人物“翠翠”长时间等待祖父而感到焦虑紧张的情绪。

金译文：“Damned low-life! You're headed for theexecutioner!”[2]

金译文采用直译法，对人物的情感缺乏恰当的理解和表达。“damned”和“executioner”在英语文化中带有浓重的消极意义，主要表达的是人物的负

面情绪，将情感强度推向极端。由此可能误导目标语读者，并因此改写了“翠翠”的人物形象。这种直译方式过于强调了负面情绪的表达，在目的语语境中显得较为粗俗，无意间扭曲了人物形象的文化真实性，影响读者对“翠翠”这个人物正面形象的感知，背离了“以善立义”标准。

戴译文：She swore under her breath，“To hell with this hooligan!”[1]

戴译文则较为温和，表达简洁，同时表现了人物的不满和愤怒情绪。通过“she swore under her breath”来表现翠翠压抑自己的愤怒情感，同时用“hooligan”来表达翠翠的轻蔑态度。这种处理方式更加细腻，更能体现人物的内心情感变化，有利于再现翠翠的真实的情感状态和善良的人物形象。与金译文相比，戴译文更加符合“以善立义”情感真实性与道德适度的翻译原则。

方言俚语的翻译本质是“地方性伦理知识”的跨文化协商。金译文误将湘西言语伦理的“仪式性暴力”误构为“实质性暴力”，其直译策略割裂了语用形式与文化逻辑的共生关系，导致翠翠的人物形象与伦理意图的双重失真，违背“以善立义”原则。戴译文以“swore under breath”还原翠翠情感压抑状态，以泛化的贬称替代文化特异性的咒骂，既保全翠翠的纯真人格，又实现了原文的伦理可接受性。

例 4：算了吧，你把宝贝孙女儿送给会唱歌的竹雀吧。[15]

这是故事中，天保、傩送两兄弟为翠翠唱完歌后，天保自知技不如傩送，于是对老船夫说的丧气话。

金译文：Uncle，look up there. If you want a songbird for your grand-son-in-law，there he is![2]

金译文通过添加敬语“Uncle”，祈使句“look up there”，显示出“口语化”特征。用“there”转换“竹雀”，表现了人物的不满和鄙视心态，与“songbird for your grand-son-in-law”中的“songbird”形成呼应，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语境信息，有助于理解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关系、说话人想要传达的具体情境，以及说话人的意图和情感。

戴译文：Stow it! You'd better give your precious girl to a song-bird.[1]

戴译文采用归化策略“Stow it!”，这一表达源自殖民航海术语，表示放弃或停止的意图，准确呈现了人物直截了当的性格特征。但在语境信息的传递上稍显不足，过度适配目标语导致无法实现知识的重构。这种直接性可能使读者难以把握原文中人物复杂情感，削弱了原文中的细腻的情感变化。

金译文通过补充语境信息，不仅保留了原文的字面意义，还增强了对人物情感和关系的表达，以敬语和隐喻移植地方性知识的善意内核，有助于促进跨文化理解和交流。戴译文通过直接的情感表达，虽然更符合英语读者的语言习惯，但在语境信息的传递上稍显不足，可能导致读者对人物关系和情感的误解。金译文和戴译文分别选择了“he”“girl”等不同的性别指称词，体现了译者对于人物性别的理解差异，以及由人物性别差异而产生的内在情感取向差异，这个现象为“以善立义”评价标准提供了新的启发。

3　基于“以美行文”标准的译文比较

“以美行文”则注重文本的美学价值，通过优美的语言、恰当的修辞和行文的节奏来增强文本艺术效果。对美的认可取决于目的语的审美标准，而且是当下的标准，因为标准是动态的[20]。在这个标准下，对目标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和阅读偏好的关注，有助于改善译文的知识重构和知识转化的艺术性和接受性。

例 5：小鞭炮如落雨的样子，从悬到长竿尖端的空中落到玩灯的肩背上，锣鼓催动急促的拍子，大家皆为这事情十分兴奋。[15]

原文描绘了一个充满活力和欢乐的场景，军士们在节日或庆典中表现出勇敢和快乐的一面。将“鞭炮”比喻为“落雨”，以动作和声音的描述，营造了一种热闹喜庆的场面。“锣鼓催动急促的拍子”进一步强化了场景的热烈和人们的激动情绪。

金译文：Daring and fun-loving soldiers，stripped to the waist，came waving their lanterns and beating their drums… The quickening beat of drums and gongs sent the crowd into a frenzy.[2]

金译文通过直译一系列动词，再现了原文的活力和节奏感。“waving their lanterns and beating their drums”中的动词，加深了动态和活动氛围。“came waving... as packs... sent sparks...”的并列句和从句，形成视觉和动作上的连贯性。“like rain showers”增强场景的视觉冲击力。最后一句保留了原文的事物主语“The quickening beat of drums and gongs”，增强了易读性，形成了相对工整的结构对仗，较好地实现了“以美行文”。

戴译文：Bundles of fire-crackers on long poles rained down upon their naked arms and shoulders，and the frenzied beating of gongs and drums added to the general excitement.[1]

戴译文将原文重组为两句，将鞭炮如雨落下转

移到士兵的胳膊和肩膀上，展现了全知视角，也增强了读者的移情感受。译文第二句“frenzied”一词，加强了节奏的快速和无序感，并与“added to the general excitement”一起补充了拟人修辞效果。

金译文较多运用分词短语、不定式结构，句式简短，有利于表现原文的动态描述，增强了译文的视觉和听觉效果，更符合翻译的美学要求，也更有利于促进跨文化理解和交流。戴译文句子偏长，语言凝重，不利于再现原文的动态描述和场景呈现，在动态性、文化意象的转化与再现以及节奏与韵律方面稍显不足。

例6：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15]

小说中，这首民歌描绘了一幅充满动感和层次感的河流景象。通过这四句歌词，可以感受到人们对于河流凶险等各种感受，以及对于壮观大自然的感叹。歌词富有动感和层次感，既体现了自然景观的雄浑，也隐含了地域文化的精神特质。

金译文：But Twirling Chicken Cage yet lacks the most ferocious foam,

The waves at Green Foam Rapids are big as any home.[2]

金译文主要采用了直译法，保留了原文的句序。原文中“白河”“青浪滩”等湘西地理标识，不仅是自然景观的客观描述，更是地域文化的精神图腾。金译文严格保留“Twirling Chicken Cage”（绕鸡笼）、“Green Foam Rapids”（青浪滩）等地理名称的直译，通过“home”一词的隐喻，将自然景观与人类栖居空间并置，暗示湘西人与河流的共生关系。这种译法不仅传递了地理知识的物质性，还通过“big as any home”的类比，赋予自然景观以人文温度，实现了“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转化。

戴译文：And Whirling HenCoop's easily passed by;

Black Billows, though, leaps up to meet the sky.[1]

戴译文采用意译法，将“青浪滩”翻译为“Black Billows”，“leaps up to meet the sky”虽强化了浪涛的视觉冲击力，却消解了原名的地域文化符号性，使目标语读者难以追溯其地理渊源，削弱了文化知识的可辨识度。但戴译文重组了原文句序，通过分词短语和转折连词的运用，生动再现了原文节奏明快的叙事。“leaps up to meet the sky”中动词“leap”的动态性与介词“up”的指向性，再现了浪涛的升腾之势，在音韵与意象层面形成呼应，更贴近民歌即兴吟唱的特质。通过使用分号和不同的行长，创造了一种变化的节奏感。每行的结尾都有明显的停顿，增强了易读性。这种对音韵的协调和节奏地把握，提升了译文的美学价值。

节奏是内容的组织形式，译文中对于节奏的再现，不仅仅是对音调、音步等格律因素的再现，也是对形式和内容融于一体的言语组织方式的再现[21]。语体对等或语体相近是民歌翻译中“以美行文”的具体体现[22]。金译文以文化地理知识的忠实移植见长，却部分牺牲了诗歌的韵律灵动。戴译文音韵协调有序，选择发音相近的词汇，较好地传达了中国地域民歌的魅力。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知识翻译学视角下，《边城》的金译文和戴译文各有千秋。基于“以真求知”的比较表明，虽然金译文、戴译文都注重文化意象的移植和文化含义的再现，但二者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结果差异明显。金译文更多采用直译法，注重所有文化意象的移植，从而更充分地重构和传播了湘西本土文化知识。戴译文中，关于原文文化意象的省略或漏译现象较多，有损于文化知识的传播。基于“以善立义”的比较说明，金译文忽略了人物内心的细腻、微妙情感变化，关于俚语的翻译，扭曲了人物形象，不符合“以善立义”的翻译标准。而戴译文采取了意译法，淡化了原文的俚语表达，将人物的愤怒和不满情绪与人物形象本身结合起来，更加生动地再现了人物形象。金译文与原文字面意义的对等，实际上过度表现了人物的负面情绪，并误导了读者对翠翠这个人物形象的感知，以及对原文文化语境和道德观念等社会语境的认知。基于“以美行文”的比较说明，戴译文中对原文句序的重组现象较多，使语言表达更加凝练，也更符合英语书面语的表达习惯。而金译文侧重于保留原文句序和原文的线性结构，句式较短，可读性更强。然而，在有关民歌的翻译实例中，戴译文表现出很强的文体意识，注重歌词的节奏感和韵律感的呈现。

总之，知识翻译学的评价视角，有助于文学翻译中的文化知识传播与重构的深度解析，也有助于丰富、拓展文学翻译评价的多维标准，超越以往“直译”“意译”或“归化策略”“异化策略”的“二元论”，促进文学翻译评价多元论的形成和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YANG, GLADYS(TR.). *The Border Town and Other Stories* [M]. Beijing: Panda Books, 1981.

[2] KINKLEY, JEFFREY C. *Border Town: A Novel*

[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9.
[3] 刘小燕. 从翻译美学观看戴乃迭对《边城》中美学意蕴的艺术再现[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02):70-74.
[4] 王建国、谢飞. 论汉英语用差异对翻译的影响：基于对《边城》四译本的对比分析[J]. 中国翻译, 2020(03):100-108.
[5] 刘汝荣. 金介甫英译《边城》中文化移植的操纵理论考察[J]. 外语学刊, 2014(06):154-158.
[6] 黄勤、谢攀. 以亲善之态促《边城》西行：译者的他者文化态度对其翻译行为的影响[J]. 中国翻译, 2019(05):64-71.
[7] 李艳荣. 运用比较美学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民族色彩[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6):14-16.
[8] KJELL AREN ROVIK. *A Translation Theory of Knowledge Transfer*[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9] 杨枫. 知识翻译学宣言[J]. 当代外语研究, 2021a(05):2, 27.
[10] 杨枫，李思伊. 真善美：作为方法论的中和翻译[J]. 中国翻译, 2024(01):9-15.
[11] 覃江华. 翻译与知识生产、管理和转化：知识翻译学刍议[J]. 当代外语研究, 2022(01):60-71.
[12] 蓝红军. 作为理论与方法的知识翻译学[J]. 当代外语研究, 2022(02):34-44.
[13] 张生祥. 基于知识翻译学的翻译研究与知识转化[J]. 当代外语研究, 2022(02):58-67.
[14] 杨枫. 翻译是文化还是知识[J]. 当代外语研究, 2021b(06):2, 26.
[15] 沈从文. 边城[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8.
[16] 李长栓. 归化也能高效地传递文化：以乐府英译为例[J]. 中国翻译, 2011(04):51-53.
[17] 蒋红红. 民俗文化翻译探索[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07(03):52-57.
[18] 朱乐红、陈可培. 英汉谚语文化差异与翻译策略[J]. 外语教学, 2000(03):65-68.
[19] 周领顺. "乡土语言"翻译及其批评研究[J]. 外语研究, 2016(04):77-82.
[20] 岳峰、陈泽予. 从知识翻译学的真、善、美标准谈知识翻译学的英语译名[J]. 当代外语研究, 2022(03):65-73.
[21] 曹丹红. 西方诗学视野中的节奏与翻译[J]. 中国翻译, 2010(04):51-55.
[22] 缑斌. 论民歌翻译的学科定位、历史现状及其策略[J]. 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2009(04):68-71.

Re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Border Tow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knowletology

YU Can, XIAO Jia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 of Tech., Wuhan* 430068, *China*)

Abstract: *Border Town* by Congwen SHEN embodies a rich repository of local culture of the wester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of China, but how to reconstruct and disseminate properly and efficiently has been overlooked in English translation study of it. The latest Transknowletology helps to framework the exploration of there-writ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language patterns, cultural knowledge of the source text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including *Border Town* by Gladys and Kinkley in terms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s and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In light of the principles of Transknowletology, such as "to know the knowledge, to establish righteousness, and to re-write finely" in translating, this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Kinkley emphasized the equitable transplant of the Chinese regional cultural imageries, linear claus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ource sentence patterns, by the participial phrases and "to+structures", with a view to reconstruct and disseminate fully the local cultural knowledge and better eligibility. Gladys prioritized linguistic fluency and readability, in accordance with written English instead of the source text, overlooking some cultural imageries or the transplanting of them, resulting much loss of cultural knowledge and modified images of the characters, though her translation demonstrates stylistic expressions in adapting specific cultural elements. This study is significant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to be free of the dualistic restraints to the literal and liberal translations, or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faceted evaluative perspectives and diversified evaluation criteria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study.

Keywo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Border Town*; comparative study; Transknowletology

[责任编校：赵　瞳]